



# 从多元到整合:我国家政工职业身份公众 认同建构的组织化实践

梁 萌

**[摘要]** 家政业是我国农村妇女向城市转移就业的重要产业。因此,家政工职业身份建构的中观组织实践与农村妇女转移就业后的工作与生活高度相关,也是该议题从宏观政策最终体现为微观个体意识的重要落脚点。本文基于长期的田野调查,提出了三类组织化实践路径,分别为企业组织路径、公益组织路径和群团组织路径。三类组织基于各自的立场与目标,分别强调家政工的性别身份、处于“草根”社会结构位置的流动劳动者和传统产业劳动者等多元但彼此独立的职业身份。但为了回应家政群体职业化发展的现实需求及身份理论机制,宏观维度的政策与制度需要整合不同组织的立场诉求与实践,将多元组织化实践下的家政工多元身份最终整合为统一、稳定的职业化身份,以作为家政产业深化发展、提质扩容的重要基础。

**[关键词]** 身份理论;家政工;职业身份;组织化实践

##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商务部公布的家政服务业年发展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家政服务业全国范围内营收为4400亿元,从业人员达2800万人,家政服务企业达68万家<sup>①</sup>。在整体家政从业劳动者中,有约88.6%的劳动者来自农村(莫荣,2018),家政服务业是农村妇女转移就业的重要产业。在新时期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大背景下,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促进家政服务业提质扩容,助力乡村振兴的家政兴农发展目标,因此商务部等14部门联合印发了《家政兴农行动计划(2021—2025年)》。该文件在肯定家政服务业吸纳农村劳动力就业成效、助力乡村振兴的基础上,进一步

**[基金项目]** 北京市社科青年项目“北京市互联网+服务业和谐劳动关系建构及社工实务干预模式研究”(19SRC016)。

**[作者简介]** 梁 萌,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

<sup>①</sup> 中国家政服务行业发展报告2017. 商务部网. (2017-08-24) [2023-01-24]. <http://images.mof.gov.cn/fms/201708/20170824160026338.pdf>.

提出巩固家政扶贫成果,强化以企业为载体,广泛动员各类社会力量积极参与促进家政服务业提质扩容。

当前,我国家政服务业已从发展初期的替补式简单劳动发展为多层级、专业化和技能化的体系健全、行业细分的渐趋成熟的产业,成为为满足民众生活多元需求的专业化产业和促进提升就业的动力来源之一。显然,家政业的发展在提升国民生活质量和促进就业两个方面都具备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但与此同时,也需要注意到该产业在发展方面所面临的挑战。

这些挑战首先体现在劳动关系方面。我国家政工一直以来都是以非正规就业为主。这一方面来源于结构性的市场因素,家政工作的市场化、职业化以家政中介企业为核心主体,而在中介制的用工模式下,家政工与客户、中介企业之间的用工责任一直没有得到界定和确认;另一方面则在于我国相关的法律法规尚未将家政业用工模式纳入规制范围。由此导致家政工在劳动权益方面面临困境,包括工作时间普遍超过8小时且无法得到加班工资,住家家政工的住宿和工餐等基本劳动条件难以达到最低标准等(马丹,2011;李雨晴,赵小仕,2015)。面对这些问题,学者们对调整雇佣关系性质提出了完善建议。一方面,借鉴国际上已有家政业的发展模式,总结了在社会保险制度、社会福利制度等不同制度文化下各国处理家政业劳动关系的经验(胡大武,2013);另一方面,基于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相关公约与倡议,结合我国实际,对调整和完善具体法律法规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包括打破劳动法不调整私人雇佣的既定范畴和家政劳动不属于生产性劳动的偏见,将家政工纳入劳动法的规制保护范围,以及建议劳动合同法对家政工等灵活性较强的服务业予以兼顾等(王竹青,吴道霞,2009;刘明辉,2012)。

其次体现在劳动保障方面。由于从属于灵活就业范畴,我国劳动法律法规所要求的基本劳动保障在家政工群体中难以实现,因此学者对劳动保障的呼吁仍然以劳动关系为核心关照(何欢,2013;张琳,杨毅,2016)。近年来,随着平台经济的发展,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会保障问题日渐受到关注,部分地区开始对重点行业开展不以甄别劳动关系为前提的社会保障政策试点。例如,在主要由雇主缴费的工伤保险方面,广东省的试点政策是在全省范围试行各类单位从业的非劳动关系特定人员单向参加工伤保险,费用由从业单位缴纳,一旦发生工伤,只核实劳动者身份和单位缴费情况,不要求提交劳动关系方面的证明材料<sup>①</sup>。而在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方面,成都的试点政策具有一定的典型性。政策规定一般新经济组织全日制使用灵活就业人员的,按

<sup>①</sup> 关于单位从业的非劳动关系特定人员参加工伤保险的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2020-10-20)[2023-01-24].<http://hrss.gd.gov.cn/hdjlpt/yjzj/answer/7553>.

企业参保办法参加社会保险,而非全日制从业人员可按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办法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该组织应为其参加工伤保险,也即灵活就业人员主要由劳动者本人缴费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sup>①</sup>。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些试点主要针对平台经济特别是外卖、网约车等行业的劳动者,对于家政业的适用性仍有待讨论,而其中对劳动者自身社会保障承担的责任边界问题也需要审慎地讨论和权衡。

最后体现在社会性别视角方面。家政劳动在传统意义上是以女性为主且无报酬的家务劳动。学者们认为从照料劳动的性别分工视角来看,家政劳动中劳动的价值一直没有得到公平的认可,这是导致家务劳动具有相对较低市场地位和劳动报酬的重要原因之一(佟新等,2015)。而在家政劳动者的职业地位方面,相关研究发现,家政行业呈现出职业性别水平隔离的趋势,被贴上了“女性化”“低技能”的标签,使家政工难以获得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应得的尊重(张琳,杨毅,2016)。在劳动过程中,也体现为由于企业与客户对家政工性别角色的期待差异,以及其与劳动者身份的冲突,使得家政工劳动中的性别角色机制最终受到了挑战(苏熠慧,2011;苏熠慧,倪安妮,2016;梁萌,2017)。这些不利于家政服务业向职业化、专业化方向发展以及推动两性性别平等。因此,学者们从性别平等的角度提出建立反对歧视和排斥的平等就业法、为女性非正规就业弱势群体提供必要的公共培训等政策建议(金一虹,2006)。

基于家政产业发展的现实情况、学术研究的呼吁与建议以及促进该产业发展以满足国民需求和促进经济发展的迫切需求。近年来,中央政府逐渐构建出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促进家政业发展的宏观发展框架,主要表现为2019年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提质扩容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以及2021年发布的《深化促进家政服务业提质扩容“领跑者”行动三年实施方案(2021—2023年)》。这两个政策文件可以看作我国家政业行业发展的重要基础性和纲领性文件。《意见》主要从劳动关系、劳动报酬、社会保险和维权途径四个方面对发展家政服务业促进就业进行了指导。基于该文件,各级地方政府依据本地区的特点和条件陆续出台了实施办法或者意见。

相关政策不仅呈现出中央政府对家政业发展的未来布局,更以各相关部门的具体任务分配和资源调配的方式进一步夯实了促进家政业未来发展的路径。其中,值得关注的是,我国在推动家政业发展方面突出了家政企业作为推动产业发展核心主

<sup>①</sup> 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新经济新业态从业人员参加社会保险的试行实施意见. 成都市新津区人民政府网. (2020-02-04) [2023-01-24]. [http://www.xinjin.gov.cn/xjxrmz/c135349/2020-02/19/content\\_789e55a6da02404babc0a960980c020d.shtml](http://www.xinjin.gov.cn/xjxrmz/c135349/2020-02/19/content_789e55a6da02404babc0a960980c020d.shtml).

体的地位。也即制定了以企业组织为推进行业发展核心主体的政策落脚点,突出体现了本土行业发展特色的政策导向,体现出我国家政行业在发展过程中的本土特征,即在宏观的结构、资源和微观层面的个体劳动者之间,中观的组织是连接二者的重要中介。在此背景下,如果说国家的行业推动政策是引领性的,那么企业等中观组织就是实践性的,是行业发展最终的落脚点,更是该行业自市场化发展以来的核心行为主体,对家政业整个行业的市场结构、用工模式、工作标准等各个方面都起着关键的作用。

因此,正处家政兴农、提质扩容等政策推动家政业行业发展的重要时点,本文认为需要梳理行业组织维度的相关实践,以明确政策实施基础和行业发展趋势。特别是,在政府着力打造以企业为核心的职业化发展路径时,鉴于企业组织一直以来的经济利益导向及其“消费者至上”的价值立场,更需要关注该行业在组织维度的相关职业身份认同的多元建构实践,以进一步反思与完善现有企业组织职业化路径,为政策进一步推进提供参考,促进家政兴农政策真正惠及农村发展和农村劳动者。

## 二、已有文献回顾:身份理论、流动人口与家政业的特征

一般职业的职业化在组织维度所涉及的领域边界主要集中于教育体系、伦理规范等职业内部自主性和合法性的建构,而外在的职业形象等则作为职业内部自主性的建构后果来呈现和分析(刘思达,2006;梁萌等,2020)。但家政业的特点在于,劳动者在面对职业化挑战时,不仅需要应对职业内部的自主性和合法性问题,还需要处理劳动者从属于流动人口的社会身份问题。基于此,有关家政业劳动者职业化发展的讨论,需要建立在社会与职业双重路径交叉的视角下,也因此讨论与家政劳动者职业化发展相关的议题时,需要纳入身份理论。在内部职业建构和外部社会身份的融合视域下讨论家政业劳动者职业化发展的相关框架与路径。

从现实层面来看,家政业劳动者职业身份建构既是政府文件中“体面劳动”的重要体现,也是一直以来企业开拓市场提升家政劳动价值的核心举措。因此,这一议题涉及政策、理论和实践多个层面。本部分将结合身份理论特别是其在国内流动人口背景下的研究发现,以及家政业的产业特征,来进一步厘清后续的具体分析路径。

### (一) 身份理论与我国的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研究

身份(identity)是社会互动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被看作个体自我基于与社会结构的互动而进行的再阐释的重要途径。在概念上身份是个体在不同社会背景中与所在位置相关联称呼的内在化,其也因此成了连接个体和社会结构的关键纽带(Stryker,1972)。也正因为身份本身所处的位置,理论家们对身份形成的论述一直存在两种主要的取向,包括结构取向和个体的能动性取向。前者认为文化和社会等宏

观结构决定了个体的身份,而后者则强调身份除了包含结构所规定的常规部分外,更重要的是个体所想象建构的那部分,这是行动者实践过程中的重要意识基础(特纳,2001:346-351)。

正是基于以上理论发展脉络,长期以来对我国流动人口身份的实证研究主要可分为两个维度。

一是宏观结构维度。学者们意识到城乡二元流动壁垒消融的同时,城乡二元的结构和制度分化仍然存在,造成从乡村迁移到城市的流动人口群体在户籍等制度上仍从属于农民,而在职业实践维度则是事实上从事产业生产的新工人,因此被冠以“农民工”的群体身份。并且,在此过程中,城市当局亦效仿以上结构,利用既有的户籍制度、城市行政管理和社会保障制度等多重系统,将流动人口在城市的身份从命名意义上的“农民工”成功地形塑为制度维度上的非市民,使其在城市的工作与生活最终呈现出非正规、临时性和流动性等特征。与此同时,大众媒体等也从文化维度参与对“农民工”身份的建构过程中。因此,来自宏观维度的制度障碍和文化偏见等是农民工群体在城市陷入生存困境的主要决定因素(项飏,1998;甘满堂,2001;陈映芳,2005;彭远春,2007)。

二是个体认同维度。研究者从社会时空和社会记忆对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互动作用机制的影响角度,提出随着流动人口代际更替,新生代农民工在身份认同方面更偏向于认可农民的社会性身份,而对制度性农民的认同在减弱。在此种身份认同的基础上,这一代农民工群体呈现出对农村社区归属感的进一步疏离,同时没有建立起对城市社区的归属意识(王春光,2001)。有相关研究提出,导致此种身份认同的原因可能并非全然来自客观的经济社会结构位置,而主要源自农民工感知到的以城市居民为参照的相对地位差异,以及其在城市实际遭遇到的歧视经验(王毅杰,高燕,2004)。并基于以上讨论,进一步提出了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多重性问题,如存在制度性身份、社会性身份等。

通观我国有关农民工身份认同的研究,主要的发展脉络基本是延续该领域的经典理论讨论,聚焦宏观结构和微观个体两个维度,讨论作为身份认同核心影响要素的宏观结构的决定性和微观个体的能动性。但更进一步的问题是,制度化、规范性的宏观结构要素是如何作用到微观个体身上的,以及个体是如何形成其身份认同的?二者的作用机制问题也即中观组织维度影响路径问题在该领域内尚未得到重视和解答。

劳动社会学从组织生产的劳动过程角度部分弥补了以上缺失。劳动过程理论通过对工厂政体(factory regime)的强调,突出了在工业生产中组织层面如何通过对工人劳动的管理与规训而影响其意识与身份认同。在工厂政体的框架下,主要包括四个基本的研究维度,即劳动过程、再生产模式、市场竞争和国家干预(布若威,2008:46)。因而,该领域的研究主要聚焦在既定的市场环境和国家制度的前提下,企业如

何组织劳动者的生产和生活,从而在这一路径下将个体的微观行动和认同与宏观结构串联起来(沈原,2006)。针对产业劳动过程的实证研究也指出,正是劳动过程中所形成的关系和经验最终形塑了第二代农民工的阶级身份认同(卢晖临,潘毅,2014)。也有研究提出,劳动中的身份区隔作为一种管理策略,不仅会产生客观劳动报酬和职业地位的不平等,也会导致群体间的心理隔阂和身份认同差异(郝彩虹,2014)。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身份认同理论的研究缺憾,呈现组织在劳动者身份建构方面的重要影响。

但从本质上来看,劳动过程理论对产业劳动者的身份认同研究核心关注如何在组织内部建构劳动者的认同,即其主要的目标在于组织内部微观的个体认同维度,而忽视了组织对于身份认同中外在的宏观结构建构努力的讨论。这当然并不是该理论的谬误,而是来源于工业生产中资本和劳动者二元主体的特性。因此,当我们讨论家政业劳动者的身份认同时,需要意识到其特殊之处。相对于工业生产中以物为对象的生产劳动,家政劳动是以人为对象的服务劳动,也称互动性服务(interactive service)劳动(Leidner,1991),因而构成了服务业劳动者在生产领域所面临的资—客—劳三元主体框架。这一生产中的特征在劳动者职业身份建构方面导致了两个问题:一是,企业在组织层面原本仅针对组织内劳动者单一个体的身份建构策略因客户的在场势必被影响,企业组织必须将客户纳入其建构的策略之中,才能完成其对劳动者身份建构的目的;二是,客户虽然构成生产过程的一部分,但其数量众多且主要受外在的社会意识而非企业内在建构策略的影响,因此企业组织必须发展出针对客户的外在的劳动者身份公共认同建构策略,才可能达到使劳动者形成稳定、统一的职业身份认同的目的。

因此,在现实和理论的双重挑战下,对于家政服务业劳动者的身份认同问题,我们仍然需要梳理组织层面的建构策略,特别是其针对客户、面向社会的公众认同建构策略。

## (二)家政业的行业特征及相关研究进展

我国家政业劳动者除了要面对与一般流动人口群体相同的弱势社会结构位置和制度障碍之外,还表现出与家政服务业从业领域相关的行业特征。

首先,与传统工业生产相比,家政业的行业特征主要体现在雇佣关系、劳动安排和工作场所等方面。

在雇佣关系方面,家政工以非正规就业为主。工业生产的雇佣关系在现有劳动、社会保障法律法规的规制下逐渐发展为以建立长期和稳定的正式劳动关系为主,企业为雇主,工人为雇员,双方在社会保障费用方面都负有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劳动者在以上框架下获得劳动报酬和相关的社会保障。但由于我国劳动法规定自然人和家庭不能作为用工单位,因此家政工无法与为之服务的家庭或用户个体结成劳动关系

(王竹青,吴道霞,2009)。在法律上,我国家政工的雇佣关系以非正式雇佣为主,主要包括两种模式,即中介制和会员制。中介制主要负责用人家庭和家政工之间的信息匹配,不负有对劳动者的其他责任;会员制下的家政工由于付出较多会费,家政企业会负责较长一段时间(如一年)的工作介绍责任,但也鲜少担负其他责任;而员工制即家政工以家政企业正式员工的方式被雇佣,双方结成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但由于实际用工方并非家政企业,因此二者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劳动关系,且基于成本考量,此类用工模式较少(马丹,2011)。由上可知,我国绝大多数家政工是处于劳动法律法规保障范围外的边缘劳动群体,劳动权益状况并不乐观。

在劳动安排方面,家政工更具灵活性、碎片化特征。工业生产在劳动法律的规制下以集中固定生产地点和时间为主,且工作对象以物为主,劳动者工作和休息时间界限相对清晰,保障基础相对完善;家政劳动以人为服务对象,且服务对象需求具有多元化和非规律性,导致家政工的工作难以约定明确的开始和结束时间,特别是老人、儿童等生活依赖程度较高的服务群体和住家家政工等工作与生活趋于融合的劳动者群体更难将工作与自身生活区分开来,往往造成家政工工作时间跨度长、任务多样且零散,难以区分工作与休息时间等。故此,家政工普遍面临超长时间的无报酬加班工作的问题(郭慧敏,2005:307;周袁红,2018:87)。

在工作场所方面,家政工在私人领域从事服务工作。工业生产将劳动者聚集在一个固定、开放的厂房内,该空间具有公共性特征;而家政工提供的是家庭内服务,工作的空间以家庭内部为主。家庭作为私人领域具有明显的私密性和封闭性,家庭间也具有差异性。家政工人在此种特征的私人空间从事工作,面临被排斥和融入难的生活问题,一旦发生劳动权益纠纷,难以得到有效的监管和保障(张伟,2010)。

其次,与一般服务业相比较,家政业的行业特征主要体现在性别特征和情感劳动两个方面。

家政工作具有显著的性别特征。根据职业的性别数据划分,女性在一个职业中占比超过60%即为女性为主的职业(Cousins,1999)。由于家政工群体中96%为女性,而且大多数来自农村和城镇下岗工人,因此是女性特别是边缘弱势女性极为集中的行业(王竹青,吴道霞,2009)。同时,由于传统的家庭性别角色分工,女性在家庭内从事的家务劳动被认为是无技能和无报酬的非生产性活动。这一方面解释了家政工群体处于较低劳动力市场位置和女性占绝大多数的原因,另一方面也预示着家庭内劳动市场化、专业化后,受传统性别分工的影响,家政劳动的劳动价值被严重低估,劳动报酬水平与产业工人相去甚远。

家政工作也具有显著的“虚拟家人”情感劳动特征。与工业生产相比,服务业最显著的特征是不仅需要付出劳动和技术,也需要付出情感,学术上称之为“情感劳动”(emotional labor)。情感劳动是指劳动者依据工作要求进行情绪管理以及表情和

体态调整,以使最终从主观感受和客观结果两个方面完成对服务对象的服务劳动,从而达到最佳的服务效果(Hochschild,2003:7)。针对服务业情感劳动的相关研究显示,由于服务劳动中的情感需求与劳动者个体自然情感需求之间往往存在较大差异,劳动过程中的情感劳动付出将使劳动者面临压抑、隔离自身自然情感的异化问题,以及对自然情感的颠覆与损耗所造成的情感耗竭问题(佟新,2013)。而家政工由于工作在家庭内私领域的特殊性,在服务业中属于情感劳动挑战最为严重的行业。一方面,家政培训过程中,管理者利用女性劳动者在家庭中“母职”角色,将其对家人的照料性情感融入劳动中,从而通过对家政工身体、情感双方面的建构达到满足被服务方需求的目的,造成了劳动者主体性的缺失以及理性与情感的割裂;另一方面,家政工在用户家庭中的具体实践也要求其从照料需求出发,一定程度上扮演好“虚拟家人”的角色,但同时其与用户家庭在实际文化经济地位上的隔阂又使其在这方面面临巨大挑战,在“虚拟家人”温情脉脉的面纱背后,是难以弥合的阶层差异和文化冲突(苏熠慧,2011;高欣,2016)。因此,家政工的情感劳动异化与耗竭问题在服务业中更加突出。

从家政业的行业特征来看,其职业化的发展和劳动者职业身份的建构面临多重挑战。既包括相对于传统工业劳动者而言,家政工具有的非正式用工、情感劳动等特征使其生产中劳动者的职业身份认同面临挑战;也包括与一般流动人口群体相比,女性为主的职业性别隔离和农村贫困女性的弱势地位,以及私领域的从业特征,使其更难被公正地认同,同时这种外在偏见也使其对自身的评价与职业身份认同面临挑战。

结合身份建构的既有理论与研究可以看到,在我国流动人口的身份建构方面,宏观结构和微观个体认同都已有较好的梳理,但中观组织维度的实践机制稍显不足。既有的讨论主要基于工业生产中企业组织在内部对劳动者身份认同建构策略,尚未关注到服务业中互动性服务劳动的特征及企业组织在社会层面建构公共身份认同所面临的挑战。具体到在产业模式、劳动关系和群体特征等方面比工业生产更具突出特点的家政业,组织维度在其职业身份的建构方面既是十分重要的实践主体,也面临组织内外的双重挑战。

因此,本文接下来将基于对家政行业组织维度的职业身份公共认同建构实践的梳理与讨论,进一步分析不同组织主体在职业身份公共认同建构方面的特点、内容与挑战,并尝试呈现出不同组织之间实践路径的特征。从身份理论的内涵可以看出,虽然未被言明,但组织作为中观维度是宏观结构和微观个体之间互动机制形成的关键主体。而以互动性服务劳动为核心特征的家政业,其组织的身份建构实践必然包括组织内部的内在建构实践和面向客户、社会的组织外部的的外在建构实践。受劳动过程理论的启发,考虑到既有研究对服务业组织内在建构实践已有较为丰富的梳理(苏熠慧,倪安妮,2016;周群英,2019;邢朝国,2021),本文将分析重点聚焦于相关组

织的面向客户和公众的公共认同建构实践。

本文的田野资料主要包括田野调查资料和田野文献资料。在田野调查资料方面,作者自2017年到2020年持续对家政产业多类组织主体展开田野调查,具体包括半结构访谈和参与式观察两种调查方法,主要的访谈对象涉及本文所讨论的三类家政组织的负责人、家政工,参与式观察方法主要为多次参与文中企业、公益组织举办的面向客户、公众的倡导活动,并作为主要编著人负责了该公益组织计划公开出版的家政工口述史的采编工作。在田野文献资料方面,由于相关组织针对客户的公众倡导不仅以举办活动的形式开展,也以公开出版图书的形式开展,且出版物作为形式稳定和传播广泛的倡导形式在公共倡导策略方面的作用显著,因此本文将相关组织出版的以树立劳动者职业身份为目的的公开出版物也一并归为田野资料的范畴<sup>①</sup>。

### 三、我国家政行业中职业身份建构的三类组织化实践

在对家政业职业化进行田野调查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主要存在三类致力于家政工职业身份公共认同建构实践的组织主体,即企业组织、公益组织和以工会为主的群团组织。在具体的建构策略选择中,组织都偏向于以公开出版劳动者口述故事或树立典型的方式作为重要的外在宣传、倡导形式。虽然究其本质,这种外在策略的深层立场是以组织的价值观为核心呈现的,但这种以劳动者公众形象为核心的倡导策略选择进一步明确了该组织策略对外建构劳动者职业身份的核心目的。基于此,后文将这类出版物的具体内容与田野调查资料结合起来进行梳理和分析,尝试从中梳理出三类组织在职业身份公共认同建构中的具体特征。

#### (一) 商业组织路径

我国家政企业的行业特点是,虽然中小企业居多,但主要由少数头部企业掌握行业主导权。因此,对家政工职业身份的建构投入,主要由大型连锁家政公司主导,主要的目标是倡导客户和社会认同家政工作作为一种常规职业所应具有的专业性与价值,从而为业务价值提升和拓展提供基础,协调客户和家政工之间的关系,为业务的延续提供良好的环境,最终助力企业的整体发展。

A家政连锁公司是家政业中的一个典型企业。该公司致力于打造高端家政市场,因此需要建构良好的家政工职业形象,以与其企业的定位相呼应。其公开出版的家政工口述故事著作,以家政工口述生命故事的形式,呈现出劳动者的主观意识与认同。

“记得有一次,我感冒流鼻涕……但雇主也没有说要让我回去休息,也

<sup>①</sup> 基于学术规范,本文所涉及的组织、访谈对象和出版物的名称均已进行匿名化处理。

没有说过一句关心我的话。我觉得我已经对他们家庭、对孩子付出了那么多,他却连生病还让我继续工作,当时心里都是负面情绪。但是后来我也理解雇主了,如果我休息,他们就要有一个人请假回来照顾孩子,那么他们的生活和工作都会被我打乱。所以就算再苦再难,我都要坚持下去。”(姚大姐口述,A企业公开出版物)

“在2016年的时候,我曾经照看过一对双胞胎,雇主对我说:‘从我们家出来之后,你就等着涨钱吧’。在他们家我学习到了很多知识,积累了很多服务经验。所以,从他们家出来之后,我的工资就真的得到了提升。现在我每个月工资有6000元,我自己认为很值得。在工作的时候,我都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做好服务,但是对于结果,我都是顺其自然。”(郭大姐口述,A企业公开出版物)

“我觉得不管在哪个行业,学的东西越多,能力和经验越多,就越充实。步入家政行业,给我最大的启示有三点:第一要有一颗忍耐的心,第二要有一颗宽容的心,第三要有一颗友爱的心……每个人的性格都不一样,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保持自己那颗端正的心。我是来服务的,不管雇主是谁都一样。”(文大姐口述,A企业公开出版物)

以上案例主要强调家政工对于客户的理解和宽容,是从人际关系而非劳动关系和劳动权益来处理二者在互动中的矛盾,从中体现出企业组织对家政业所面临的法律法规根本困境的回避和对劳动过程中劳动者情感投入的强调。同时,也在结果上刻意突出了和谐的人际关系给劳动者带来的个人成长和经济收益。

对家政工的工作价值,则主要体现在经济维度,即通过从事家政而获得一份收入,从而满足家政工家庭的经济需求。

“做了这么多年家政,我从来没有跟雇主发生过矛盾和冲突。我不爱攀比,也很容易知足。家政带给我的变化也非常大,只要身体情况允许,雇主有需要,我就会做下去。”(辛大姐口述,A企业公开出版物)

“因为孩子得吃奶粉,但家里经济条件不好,所以我就自己出来挣钱。也正是因为这样,现在每次提到孩子,我心里就会很愧疚,觉得没能在他们身边陪他们长大,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可能是自己孩子不在身边的缘故,我把遗憾都弥补在了照顾雇主的孩子身上。在别人眼里,可能做育儿相比其他要赚得多一些,可是在我的心里,我是因为真心喜欢孩子才选择这份工作,这是我的初衷。”(庞大姐口述,A企业公开出版物)

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商业路径对家政工作价值的倡导主要体现在忍耐、奉献、知足等方面。但这些特质既是人格和道德品质层面的要求,更是从性别角度对家政工传统乡村女性性别气质的渲染与倡导,同时也遮蔽了家政工在劳动领域的核心劳

动价值。

此外,在口述中也会重点突出家政工来自农村贫困家庭的弱势地位与个人成长经历。

“A公司把我们很多在外地,尤其是在农村受到经济困扰的女性解救出来,让我们接触家政、爱上家政。更重要的是,让我们这些家庭妇女在经济上独立。”(朱大姐口述,A企业公开出版物)

“虽然在北京八年,但是我不认为我是北京人。我的学历很低,我觉得与北京人不管生活方面还是文化方面,都有很大的差距。我也没想过长期留在北京,或许等过几年孩子有了下一代,我就回家尽自己的义务去。”(辛大姐口述,A企业公开出版物)

“在我心里,A公司就是一所大学,它教会我一些很实用、很科学的知识。在这里,我不仅得到经济上的帮助,还得到过精神上的帮助。”(刘大姐口述,A企业公开出版物)

而另一家平台家政企业(W企业)也在此方面做出了相同的努力。从2020年起,该平台家政企业开始评选十大W之星,并通过媒体向全社会公开表彰,本文仅举其中一例。

“在W平台上,许多女性劳动者凭借自己勤劳的双手,改变了家庭经济状况,成为家里的经济支柱,她们抓住平台提供的全新机遇,同时憧憬着更美好的未来。

保洁师H在加入W平台之前,已在家居质检行业从事17年,虽是中高层,但每月仅有3000多元的收入,其家庭并不富裕。尤其是在丈夫因病失去工作能力、儿子上大学需要支付学费的情况下,家庭经济状况更加捉襟见肘。加入W平台成为保洁师的一员后,H不怕吃苦,每天接单到晚上十点多,刚入行月薪即达到4500~5000元。‘少说话,多做事’,H总结经验时说,‘用努力赢得用户肯定,就会有更多用户信任我、推荐我’。如今,H通过自己的努力已成为平台合伙人,用自己一个人的努力支撑起了全家人的生活。”(X平台新闻报道)

通过对家政工自身弱势的教育背景、经济情况和社会地位的分析以及作为农村贫困女性群体特征的强调,企业组织想要呈现的是家政工作带给该群体的正面影响,包括经济独立、技能提升、开阔视野和脱离困境。简言之,其主要呈现的是以“忍耐、感恩”为核心的女性家政工个人成长特征,从而以具有职业道德品质和感恩情怀的女性从业者形象构筑其与客户之间可持续的和谐用工关系。但这里对家政劳动者品质和价值的强调,主要是从人性品质和性别身份的角度,而不是从劳动的价值和劳动者权益角度出发的;对家政工作为流动人口等弱势群体的社会身份,并未从整体性视

角的结构不平等立场加以反思,而是工具性、中立性地将其处理为该群体从业的个体化背景。这体现出商业组织在面对家政职业身份建构时,对行业非正规用工等框架性、结构性的本质问题的规避特征。

除了以文字倡导的形式,A公司还会通过日常的集体活动,进一步使相关理念落地。此外,公司会通过年会推选出最佳雇主,通过呈现正面典型的方式对客户进行倡导,以体现企业所期待的以良好人际关系互动为主的用工方与劳动者的样板模型。

因此,A企业对家政工职业身份公众认同的建构与倡导十分重视,其负责人在访谈中甚至表示希望政府推动雇主的倡导活动。

“雇主要做一些雇前培训,接受一些家政公司举行的培训,也就是家政培训不仅仅针对家政保姆,还要针对家政雇主,知道作为雇主的责任、义务、权利,这就叫划边界,要不然你永远都没有这个边界感。所以这样子的话也能够避免一些纠纷,很多人他是不理解家务工作和家政工职业的。”(A企业负责人,2017年7月访谈)

虽然以上建议在政策层面不具適切性和可行性,但足以显示出从企业组织的角度对家政职业身份建构公共认同策略的迫切性,以及其在家政工整体职业身份建构过程中的必要性。

当然,以上A公司的家政工身份建构主要集中于外在的社会层面,是针对客户的策略。而在公司内部对劳动者的培训中,也一直存在以劳动者自我身份认同为目的的组织内身份建构策略。其特点与既有研究发现的一致。一方面,通过在培训过程中对家政工作中劳动者在客户家庭中的家庭角色的强调,替换其劳动者身份的本质属性和相关权益,从而达成对客户与劳动者人际关系的建构;另一方面,则基于劳动者的性别身份,对其知识、技能和行为品性进行重塑,促使其展现出积极、友爱和奉献的身份特征(苏熠慧,倪安妮,2016;周群英,2019)。鉴于此方面的既有研究已分析得较为充分,本文不予展开。

综合以上材料,商业组织的职业身份公共认同建构主要通过聚焦倡导家政工基于技能、成长、诚信和忍耐的人性品质以及农村贫困女性成长的性别身份,向劳动者和客户倡导一种商业化的具备转换为经济收益的家政劳动价值和双方互动的人际关系模式。这有利于双方形成稳定长期的合作互动关系,强调通过用工双方之间的沟通与理解来解决问题,但回避了该群体作为流动人口的整体性社会结构位置的公平性等相关问题。

## (二)公益组织路径

这一建构路径的主要推动者是以家政工为服务对象的社会工作组织和公益慈善组织。这类组织本身没有商业盈利的目标,主要以为家政工提供工作与生活资源支持为日常业务。几年前的一本由公益慈善组织资助出版的家政工口述史著作,引发

了媒体与公众对家政工领域的关注和讨论。这本书的采编和出版是由作者与公益慈善组织、几家面向家政工的社会工作组织密切合作完成。该书的核心内容围绕几家组织中的核心家政工的人生故事与自我讲述展开,因此其倡导的劳动者职业身份的意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相关公益组织策略与意识的反映,可以作为公益组织路径在外在公众倡导的标志性文本。从具体内容来看,该书主要通过以下两个方面来建构家政工的身份。

一是,通过呈现家政工的生命故事来突出其社会结构中的困境。

“路大姐以及她的家政工作,是家庭唯一的经济支柱。然而,除了年幼的儿子,她还需要照顾年迈体弱的老母亲,以及患精神分裂症的丈夫。路大姐今年45岁,自己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即使每天吃药维持,血糖依然不降。然而比起健康,更让她心惊胆战的是,生怕哪天被丈夫打死。她想过自杀,但为了儿子,还是想再撑一撑,即使未来是那么令人绝望。”(路大姐,摘自家政工口述史出版物)

“2012年,林大姐的丈夫酒后骑摩托车,为躲避迎面而来的车辆,连人带车撞到了路边的电线杆上。他在医院捡回一条命,胳膊却残疾了……然而,丈夫因为无法接受现实,心理压力过大,喝药自杀了,留下35岁的妻子和10岁半的儿子。”(林大姐,摘自家政工口述史出版物)

这些生命故事确实反映了部分家政工从事该行业的背景和原因,即源自其农村贫困家庭的身份和家庭生计需求。而通过对家政工个体化困境的呈现,公益组织本质上意在进一步凸显家政工群体本身所面临的结构困境以及作为流动人口群体的社会身份特征。例如,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就业机会限制、劳动力市场分层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保障资源缺乏、性别刻板印象等方面的影响,使农村贫困女性只能从事非正式用工和报酬较低的家政工作。

二是,突出劳动过程中的价值和挑战。

“在这之前,她特意到市场上扯了被面、买了棉花,亲手缝了个小被子,送给雇主家的孩子。孩子妈妈不会缝,市场上卖的现成被子质量又不好。收到这份小礼物时,女主人高兴地跳了起来,连声说‘李姐,你做的被子太漂亮了!太好了!’”(李大姐,摘自家政工口述史出版物)

“雇主做直销,平时很忙,看到安姐和孩子处得不错,便请求她过来住两个晚上陪陪孩子……一次,听说幼儿园要举办讲故事比赛,她便给宝宝讲了几个故事。小女孩特别有灵性,拿了个特等奖回来……孩子妈妈得知这个好消息也非常开心,直说‘这是我们孩子人生中第一个奖’。从那天开始,孩子每天背着海绵宝宝书包去上学。安姐也开始从家政工作中持续地收获成就感。”(安姐,摘自家政工口述史出版物)

“他家有俩孩子,我在他家每天干十几个小时。我不闲着,有时间就啥都干,洗衣服、做早点、擦地板,给两个孩子做的饭也都不一样。中午我跟老二一起吃,下午三点老大回来,我又要做一顿饭。雇主还觉得我在家没事,我为啥没事咧?他们回家晚了还若无其事,不觉得占用了我的时间,还说‘哎呀,你去给我做点饭吧’‘你去把我手机电充上吧’……本来说好的每天十小时,但没有签合同,就没有第三方监督,我也不好说。所以我坚持干,过完年就不干了。”(刘大姐,摘自家政工口述史出版物)

通过呈现家政工在劳动过程中对客户家庭的贡献,展现出家政劳动作为一种专业化的工作应该具有的价值,既包括劳动技能也包括知识技能等,使公众看到家政劳动的专业化特征,从而进一步推动对家政工作的职业化认同。与此同时,公益路径也不回避客户和家政工之间存在的问题和矛盾,书中呈现了克扣工资、延长劳动时间等侵犯劳动权益的事件,但没有如商业路径一样倡导忍耐和奉献,而是更加真实地反映了家政工的反抗和力量,包括与客户谈判和“用脚投票”等。

除此之外,公益组织还会通过公开的大众倡导活动,开展相关职业身份的公众认同建构活动。以Y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为例,其通过举办家政工艺术节,一方面以家政劳动者的“手”为主题邀请艺术家创作专业摄影作品,另一方面邀请学者、客户和家政劳动者共同参与活动,以歌曲、诗和纪录片等多种形式,向公众展现家政工的劳动价值及其结构困境,以引发公众对该群体的关注、理解和支持。

从公益路径来看,其对家政工结构困境和劳动价值的双面呈现,一方面意在建构人们对家政群体来自农村贫困家庭和作为流动人口的弱势结构位置的深刻理解和认同,另一方面也强调家政工作的劳动价值以及歧视与非正式雇佣关系所带来的劳动权益保护的缺失。最终凸显家政工虽困于不利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位置,但仍然努力向前的、具有明确劳动价值诉求的流动人口草根劳动者身份,希望引发公众对这一群体的同理心和认同感。

### (三) 群团组织路径

群团组织路径的主要发起者是学者和地方政府支持的群团组织。X市作为西部地区的省会城市,以国企为主要产业主体的制造业曾经非常兴盛。以促进下岗女工再就业为目标,X市的市总工会支持当地建立起国内第一个家政工的专门工会,吸引了包括下岗女工和农村进城务工妇女在内的大批家政劳动者。该工会的核心骨干都是普通家政工成长起来的。在此路径下,主要的策略为:延续体制内产业工人传统,将家政工纳入现有工会体系,开展技能竞赛与表彰奖励。

X家政工会由于隶属于市总工会,因此被批准参加工会组织的相应活动。现有工会组织的相关活动主要是基于传统产业劳动者的需求和角色定位设立的,包括每年组织的劳动关系竞赛以及不定时举办的劳动技能培训,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表彰

奖励。

“工会对我们确实是支持的,我们现在用的这间房子都是工会无偿提供的,包括里面的空调、桌椅板凳都是工会无偿提供的,水电费都没收,今天我们去交水电费,人家说你们先忙你们的,到时候再说,确实对我们很好,对我们很照顾。如果不是这个,我们会费根本维持不下来。但是靠着大树还是好乘凉,在总工会下面我觉得还是得到了不少照顾。还是干得非常好的,最后是三八红旗手,还有人是X市家政状元。”(X家政工会座谈资料,2017年11月)

“1998年,李好下岗了。家庭破碎,儿子上高中,家里所有的重担全都压在她的身上。但生活的困境并没有击垮她,反而让她鼓起更大的勇气去拼搏。面对自己年龄大、文化程度低、没专长的实际情况,为了孩子,为了生活,她放下面子干起了家政工作,一干就是九年。勤奋的工作让她获得了全国优秀家政服务员、家政服务标兵、市总工会优秀基层工会干部、区巾帼创业带头人、三八红旗手和巾帼双文明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2003年,她和几个姐妹成立了家政小组,共同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2004年,她们加入由市总工会指导成立的全国首家家政工工会,共同面对困难,实现自我教育。如今,每当有新的家政姐妹入会,李好都要鼓励她们,手把手为家政姐妹传授工作技巧和工作经验。”(西安日报报道,2007年7月)

在总工会的统筹下,家政工会也保留了相对独立的活动空间。

“就是省工会拿的奖状。我带领她们参加比武,获奖了。平时这些A区的交流会就是我跟,当时大厦那边在那里头开会,还有针织拿来让大家看看我们在一起交流交流,沟通沟通。真的是挺好的,也听听其他姐妹的经验,用人家的长处弥补一下自己的短处。在一块学习学习,交流交流,就是那样子。”(W姐访谈,2017年11月)

“其实对咱们家政工这个群体来说,大家都是比较困难的,家里如果很有钱,不一定做这个工作。所以遇到困难的时候,还可以找工会。因为我作为工会的委员,有时候代表家政工会去慰问一些住院的姐妹们。包括我们过年有些姐妹身体特别不好,发了米面油也拿不回去,没有办法我们给送过去,顺便看一下她,送温暖。作为我们来说,说是工会,其实跟个互助组一样。包括有些姐妹有病了,住院的时候我们姐妹会轮流去伺候,就是会有一些单亲姐妹,子女不在跟前,子女在外地,躺在床上想喝口热水都没有。”(X家政工会座谈资料,2017年11月)

由此可见,由于市总工会在体系和物质等方面的庇护与吸纳,X家政工会得以顺利运转,并按照国企的工作传统开展互助、慰问和技能提升等活动。在此过程中,一

方面借由工会体系延续的模式建立起工作的安全感和荣誉感,在组织内部也建立起家政工群体间的互助团结关系,产生女工之间组织化的“姐妹情谊”,进一步加深了家政工群体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另一方面借由参与到传统产业劳动者队伍中的模范表彰、树立典型等内外倡导活动中,实现将新兴家政服务业劳动者与传统产业工人形象的融合,将家政工群体由流动人口的社会身份转换为产业工人,重建了家政劳动在组织内在和外在双方面的价值感与认同感。

“家政工会成立13年,没有一个会员到雇主家拿人东西偷人东西。很多雇主为啥会认可家政工会,一去问你是哪的,我们是家政工会的会员,拿出会员证,雇主愿意用。雇主觉得首先品德好。这是一个集体。”(X家政工会座谈资料,2017年11月)

透过群团路径建构的家政工形象,在组织内部和外部建构了劳动者和客户基于传统产业劳动者身份的社会结构位置、集体荣誉感,从而产生对家政工职业身份的认同。这一路径的特色在于,其是基于既有产业劳动者职业身份建构的传统路径产生的,根植于具有深厚国企制造业背景的X市,在客户和劳动者的集体记忆中都对该背景拥有天然的亲切感和认同感,因此更容易被接纳和传达。而与此同时,在被纳入传统产业劳动者身份建构的过程中,家政业本身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特别是其外在的公共认同身份建构,较企业和公益路径在范围和程度上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其以树立模范典型、表彰奖励等方式作为劳动者职业身份公共认同建构的努力,在传播的范围(市级媒体)和形式(简讯、播报)上较前两种途径稍弱一些,但在其所辖的市一级范围内,仍然具有较为明显的外部影响力。其职业化劳动者的身份很快被当地客户所认可,从而为家政劳动者的工作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访谈中也发现,基于此,工会X市几百位贫困家政女工重拾信心,不断提升技能,借助工会平台最终在家政岗位上实现了人生发展目标和价值。

当然,特殊的发展基础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X家政工工会存在了13个年头,有无数会员从中获益,上百位家政工成为核心骨干,也成为家政服务业的模范和标杆,获得了许多个人和集体荣誉,改善了家庭生活,也赢得了社会对家政业者的尊重和认可。但随着社会 and 家政行业的发展,X市从整体上部署了家政行业的工会工作,倡导相关家政企业成立企业内部工会,同时设立了家政行业联合会替代原有的家政工会,其成员则主要为企业的管理者。在此背景下,原有的家政工工会在做好交接后,完成了历史使命。即便如此,今天我们回顾家政工工会的发展历程,其对于家政行业发展的启示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未来促进家政服务业发展提供了多方面的可供参考的政策和实践模型。特别是,我们看到从属于非正式就业的服务业劳动者,仍然具备被制度吸纳的空间,从而能够进一步展露出传统产业劳动者在技能、荣誉和身份认同等方面的特征,使非正式就业状况下的家政劳动者也能够获得公众

对其普遍化的职业化劳动者身份的认同。

#### 四、结论与讨论：从多元到整合的家政工职业身份

总体来看,我国现阶段各类组织在家政工职业身份方面的外在公共认同建构实践是多元和丰富的。但同时,各组织之间的建构路径则是基本独立、各有侧重的,主要具备以下特征。

在职业身份方面,商业组织强调家政工农村女性的传统性别化身份,意在建构其与客户间以人际关系为主的可持续合作;公益组织强调家政工在社会结构中的农村贫困弱勢身份,意在形塑公众对家政工作的尊重与支持;群团组织则将家政工纳入体制内劳动者的传统劳动者范畴,试图在正式劳动关系的框架之外探索从技能、身份认同等方面形塑非正式就业者的劳动尊严与价值认同。

而在家政工作为流动人口的社会身份方面,三类组织分别采取了回避、凸显和融合策略。商业组织将其流动人口的社会身份工具化地处理为一种天然社会背景,而忽视了对其中的结构不平等问题的讨论;公益组织通过突出其在城乡二元等不平等社会结构中的困境,建构公众的同理心和对劳动价值的认同;群团组织则通过将其纳入产业劳动者的范畴,转换公众对家政工群体作为流动人口的常规认知。

在实践路径方面,组织层面的职业身份建构主要遵循两条路径。一条是外向型的,即面向客户、公众的公共倡导路径,通过媒体和书面故事等,构建外在群体对家政工职业身份的认知与认同;另一条是内向型的,通过组织群体内的“姐妹情谊”和技能认证与荣誉授予,建构劳动者群体内部对自身价值和职业身份的认同。在此过程中,既有主观价值观的传导,也有自上而下的物质、政策资源的传递,还包含了从内在职业主体性和外在社会结构位置的双方面影响渠道,从而将相关维度的职业身份最终落实于劳动者和公众的意识之中。因此,这类组织化的努力,其实践的路径和模式相对稳定成熟,符合我国经济社会的实际情况,且其实践的成效也较为显著,足以作为落实我国家政业劳动者职业身份的产业发展需求的重要举措。

但同时也需要意识到,在实践层面,家政工群体的身份特征是多元的,不同组织的建构实践基于组织的立场是有所侧重且相互独立的,这显示出组织作为建构主体的边界性和局限性。特别是在政策中已被推动作为职业化组织层面主要产业主体的企业,其由于具有追求经济利益的立场和消费者至上的价值观,在推动家政劳动者职业身份建构过程中可能造成局限和偏颇,需要引起重视。

因此,从助力乡村振兴、家政兴农的视角来看,使农村妇女在转移就业过程中能够全面受惠、整体提升就业质量和生活水平,要求家政产业的职业化发展同时兼顾劳动者多元身份特征的整合建构和认同。即全面构建家政劳动者职业身份以使其克服

不利的贫困弱势社会结构地位、城乡二元制度和性别化分工的文化挑战,从而实现公平的劳动价值和体面劳动的目标,是其实现和可持续的重要基础,具有明显的必要性。目前,家政产业的具体发展政策中以企业为核心主体的路径选择,需要进一步分析与完善,包括推动企业从狭隘自身利益到整体行业发展的立场拓展与跃迁,也包括引入多方主体推动职业化的政策空间与可能性。最终将家政劳动者多元但独立的身份建构实践,整合为统一、稳定的职业化身份。

同时,在身份理论方面,既有的实证研究主要聚焦宏观结构对劳动者身份的决定性以及微观劳动者个体对其身份的认同能动性两个方面,其形成机制则仍付之阙如,即中观组织在劳动者身份建构过程中的作用一直是被忽视的(Leidner, 1991)。虽然劳动过程视角对此有所涉猎,但限于产业特点,也仅关照到组织内部建构劳动者认同的内在建构机制。本文通过对家政业这一互动性服务业的劳动者身份建构组织路径的梳理和归纳,勾勒出中观组织层面在劳动者职业身份建构方面的内在与外在双重机制。特别是基于家政业的资—客—劳三元主体框架的产业特点,呈现出中观组织身份建构方面外在机制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由此,反映到身份理论的内在构成,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虽然身份本身存在结构和个体两个取向,但其建构机制却不仅限于宏观结构和微观个体两个维度,中观组织是宏观与微观相互作用机制形成的关键主体。在相关议题的实证研究中,应将其纳入分析框架之中,特别是职业身份等集体维度的认同,组织主体的作用和组织维度的机制可以说是关键要素。

而具体到家政劳动等互动性服务劳动类型,对组织维度的身份建构的讨论不仅牵涉到理论的拓展,更关系到产业的实践与发展。尽管组织的职业身份公共认同建构机制有利于社会整体对劳动者职业身份的认同,但与此同时,也要看到不同组织类型所强调的劳动者身份特征是具有差异性且各自独立的,而产业发展又需要因劳动者的多元困境与需求呈现出统一、融合和稳定的职业化形象,如此才能成为促进产业可持续健康发展的坚实基础。因此,虽然中观组织的身份建构是自发的、能动的和有效的,但也因基于不同组织利益而产生的多元、独立的特征而需要来自宏观制度的统筹和整合。由此,不同组织化实践下的多元且独立的身份建构通过融合、流动,最终实现家政产业劳动者统一的职业身份建构与认同过程,以作为产业深化发展、提质扩容的重要基础。也即在家政工职业身份建构的组织化实践中,既需要组织的能动性和内外机制,也需要宏观制度化的统筹,从而最终促使微观个体(客户、劳动者等)形成对职业身份的稳定认同。从这个角度看,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维度主体间的相互作用机制也是身份理论中的重要议题。

#### [参考文献]

- 陈映芳,2005.“农民工”:制度安排与身份认同.社会学研究(3):119-132
- 甘满堂,2001.城市农民工与转型期中国社会的三元结构.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4):30-35
- 高欣,2016.怒放的地丁花:家政工口述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郭慧敏,2005.去工业化、边缘化、女性化和去权益化——一个家政工群体的权利伴生现象分析//郭慧敏,主编.社会性别与劳动权益.西安: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
- 郝彩虹,2014.身份区隔:生发于本土土壤的劳动管理策略——对某国有建筑企业地铁工地的个案研究.青年研究(2):32-43
- 何欢,2013.美国家庭政策的经验和启示.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147-156
- 胡大武,2013.家政工人休息时间的法治化.社会科学辑刊(1):62-66
- 金一虹,2006.女性非正规就业:现状与对策.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6-10
- 李雨晴,赵小仕,2015.走向体面劳动——论家政行业劳动关系的规范.山东工会论坛(6):1-4+33
- 梁萌,2017.强控制与弱契约:互联网技术影响下的家政业用工模式研究.妇女研究论丛(5):47-59
- 梁萌,吕游,刘万丽,2020.嵌入与消弭:中国家政业职业化实践研究.妇女研究论丛(5):28-41
- 刘明辉,2012.家庭工人体面劳动公约对中国立法的影响.妇女研究论丛(3):40-45+54
- 刘思达,2006.职业自主性与国家干预——西方职业社会学研究述评.社会学研究(1):197-221
- 卢晖临,潘毅,2014.当代中国第二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情感与集体行动.社会(4):1-24
- 马丹,2011.北京市家政工研究.北京社会科学(2):64-68
- 莫荣,2018.中国家政服务业发展报告(2018).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 彭远春,2007.论农民工身份认同及其影响因素——对武汉市杨园社区餐饮服务员的调查分析.人口研究(2):81-90
- 沈原,2006.社会转型与工人阶级的再形成.社会学研究(2):13-36
- 苏熠慧,2011.控制与抵抗:雇主与家政工在家务劳动过程中的博弈.社会(6):178-205
- 苏熠慧,倪安妮,2016.育婴家政工情感劳动的性别化机制分析——以上海CX家政公司为例.妇女研究论丛(5):17-24
- 特纳,2001.社会学理论的结构(第6版):上.邱泽奇,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 佟新,2013.我国服务业的工作和劳动关系——以星级饭店业的工作和劳动关系为例的研究.江苏社会科学(2):12-18
- 佟新,周旅军,马冬玲,2015.关怀经济学与投资女性——中国经济的新增长点.社会发展研究(2):41-61
- 王春光,2001.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社会学研究(3):63-76
- 王毅杰,高燕,2004.社会经济地位、社会支持与流动农民身份意识.市场与人口分析(2):1-5
- 王竹青,吴道霞,2009.论家政工的劳动权利.妇女研究论丛(6):11-15
- 项飏,1998.社区何为——对北京流动人口聚居区的研究.社会学研究(6):56-64
- 邢朝国,2021.疫情之下非正规就业的“超不稳定性”及主体应对——以北京市月嫂为例.妇女

研究论丛(3):37-52

张琳,杨毅,2016. 人口新常态背景下农村家政女工生存与发展现状调研——基于北京、广州、武汉、西安的样本分析. 湖北社会科学(5):51-57

张伟,2010. 社会性别主流化视角下的家政工社会与法律保护分析. 河北法学(8):97-104

周群英,2019. “家里外人”:家政工身份转换的人类学研究——以阈限理论为视角. 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88-96

周袁红,2018. 家政阿姨口述实录. 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

Cousins,Christine,1999. Society, Work and Welfare in Europe. Basingstoke and London:Macmillan Education UK

Hochschild,Arlie Russell,2003. The Managed Heart: Commercialization of Human Feeling. Berkeley,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Leidner,Robin,1991. Serving hamburgers and selling insurance: gender, work, and identity in interactive service jobs. Gender & Society(2):154-177

Stryker,Sheldon,1972. Symbolic interaction theory: a review and some suggestions for comparative family research. Journal of Comparative Family Studies(1):17-32

## From Diversity to Integra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Professionalization Identity for Domestic Workers

LIANG Meng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rofessional identity of domestic workers by various organizations in China is an important mechanism connecting macro policies and micro individual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ree kinds of paths: enterprise organization path, non-profit organization path, and mass organization path. The three types of organizational practices respectively emphasize the gender identity of domestic workers, the identity of vulnerable groups and the identity of traditional industrial workers. Although the identity dimensions are diverse, they are independent of each other. Howeve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omestic industry needs to integrate the positions of different organizations, and finally integrate the diverse identities of domestic workers into a unified and stable professionalization identity.

**Keywords** Identity theory; Domestic worker; Professionalization; Organizational practice